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



共青团辽宁省委宣传部编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

•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回忆录 •

共青团辽宁省委宣传部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60年·沈阳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

共青团辽宁省委宣传部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林园路二段富韵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辽文出字第1号
旅大文教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7/16印张·130,000字·印数：1—50,000 1961年3月第1版
1961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909·312 定价(5)0.46元

前 言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毛主席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是取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伟大胜利的指针，是鼓舞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战斗号角。进一步深入地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就能使我们更好地掌握革命斗争的武器，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不致迷失方向，在严重的政治风险面前，能够经得起考验。

我们青年，大多数没有经历过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的考验，对于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在一系列问题上的重大发展和无比丰富的革命经验，极其缺乏，迫切需要认真地学习。为了帮助青年们更深入地学习和理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革命斗争的传统，我们选编了一些有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回忆录，供作学习参考。由于编选仓促，如有不当之处，望指正。

1960年12月25日

目 录

- 美蒋和平阴谋的破产.....吴玉章 (1)
- 毛主席在重庆.....龍飛虎 (29)
- “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将 劉 彪 (35)
- 剝去美軍的画皮.....少将 仲 曦 京 (49)
- 在“調处”的外衣下.....少将 曾 雍 雅 (62)
- 毛泽东思想是胜利的源泉.....少将 程 悅 長 (70)
- 英明的預見.....袁學凱 (91)
- 伟大的轉折.....關長林 (100)
-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周赤桦 (133)
- 光輝的辽沈战役.....中将 李作鵬 (152)
- 虎口拔牙.....少将 曾 雍 雅 (166)
- 在淮海南綫.....袁光華 (181)
- 回忆天津战役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劉亞讓 (194)
- 記天津战斗.....少将 張 燭 麟 (211)
- 砍掉蛇头.....少将 江 擁 輝 (217)

美蔣和平陰謀的破產

解放戰爭初期的一段回憶

吳玉章

还在抗日战争后期，美帝国主义即加紧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妄图在战后代替日本的地位，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蒋介石依靠了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不积极准备力量，以反攻日寇，收复国土；却处心积虑地在那里布置阴谋，准备内战，坐待胜利到来之时，好从峨眉山上杀下来，一举把共产党、解放军消灭，以恢复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对于蒋介石的反动阴谋，中国共产党早已洞若观火。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即曾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日宣战。在苏联红军的坚强打击下，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经过八年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中国人民，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该是多么的兴奋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却一面下令解放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解放军进行反攻、收复失地；一面又令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以待蒋党去“接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

实行蔣日合作与蔣伪合流，其目的不但要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而且还想进一步从根本上把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加以消灭。

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在抗战胜利的时候，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了。解放区已经拥有一亿以上的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一百万人，并有民兵二百多万；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一百数十万党员的大党，而且政治上已经成熟，它完全能领导全国人民，越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针对着蒋介石国民党的“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动方针，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中，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革命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我们一方面要力争和平，反对内战；一方面又要对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革命计划，作充分的准备。就是说，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方针，而这时国内人民和国际舆论又都反对蒋介石进行内战，同时蒋介石也觉得他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好，还需要一些时间，以便把更大量的军队运到内战前线去，因此他决定要玩弄一次和平阴谋。于是，这个靠内战起家、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居然装扮成和平妖怪。竟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二十日和二十三日，一连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和平”。这分明是要的鬼把戏，应不应该理它呢？毛泽东同

志認為：為了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為了揭露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陰謀，以團結和教育廣大人民；我們應該去。如果我們不去，就恰中了蔣介石的詭計，他正是希望我們不去，以便借此說我們拒絕和平，發動內戰。因此，毛澤東同志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毅然決定飛往重慶。聽說毛主席要去重慶，延安的廣大軍民都非常擔心。因為中國歷史上曾有過許多“鴻門宴”之類的事情，而蔣介石對待李濟深、胡漢民等人的流氓手段^①，人們記憶猶新，人們為毛主席擔心並不是沒有根據的。但是，毛澤東同志正確地分析了當時國際、國內的形勢，認為有強大的人民力量特別是解放區的力量作後盾，蔣介石是難於重演南京湯山的舊戲的。就在毛澤東同志快要起身的時候，戴老（范文瀾同志的愛人）還趕來對我說：“請告訴毛主席，我們勸他千萬別去呀！”在臨上飛機的一刻，我轉告了范老夫婦的意見，毛澤東同志笑了一笑，說道：“謝謝他們的好意，我注意一點好了。”就這樣，毛澤東同志於八月二十八日下午，由周恩來、王若飛等同志伴隨，在千萬人民的歡呼聲中，到達了重慶。

毛澤東同志的降臨，使重慶整個山城為之沸騰，使整個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都充滿了希望。無數的工人、學生和市民熱烈地歡迎毛主席，把毛主席稱為中國人民的救星。許多人為此感動得流淚。柳亞子興奮地写出了他新的詩章^②。善良的人們是如此渴望和平，他們哪里知道蔣介石的葫蘆里裝的完全是“和平”的假藥。

毛澤東同志的到達重慶，完全出乎蔣介石的意料。由於他事前對談判毫無準備，所以我們的代表一去，就把他弄得手忙腳亂，在政治上完全陷於被動。蔣介石雖然派了王世杰、張群、

张治中、邵力子为代表来和我党的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志进行会谈，但他们对谈判并无诚意，只不过成天地虚与委蛇，一切的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他们只是消极地应付而已。而且，就在毛泽东同志飞抵重庆的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就密令各战区印发他在一九三三年所编写的罪恶手册——“剿匪手本”。九月十七日，蒋介石又密令送发这些手本（密令和手本均被我缴获）。同时，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对我晋冀鲁豫解放区上党地区的进攻，也在九月间就开始了。

经过四十多天严肃的谈判斗争，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形势，不得不在表面上接受我党提出的和平团结的方针，不得不虚伪地同意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派平等合法地位、严禁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民主的地方自治、改革和裁减全国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等主张。所有这些，都写在国共两党代表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签订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面。这有什么好处呢？毛泽东同志说：“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为了争取和平，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间人士的同情，以击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我党在谈判中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我们同意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八个解放区；同意按比例缩编我们的军队，如果国民党真的肯把它的军队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的话，那末我们可以把解放军缩编为二十个师，只占全国军队的七分之一。但是，国民党的目的是要根本消灭解放

区和解放軍，因此关于解放区政权和軍隊的問題，始終未能达成協議。重慶談判的經驗再次証明，政权和軍隊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因而成为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焦点。誰如果忘記了这一条，誰就要犯严重的錯誤。

由上可見，我党在談判中虽然作了一些讓步，但这些讓步都是有原則的，并無損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在涉及根本利益的問題上，我党則不懼任何威胁，始終坚定不移，毫不退讓。而且，在談判期間，我們絲毫沒有放松警惕，我們对国民党的內战陰謀，作了必要的准备。在党中央的一次會議上，少奇同志（他当时代理主席的职务）就提出要把南方的一些部队調往北方，这样既可巩固北方的解放区；又可使这些部队在內战一旦发生后，不致孤悬敌后，被人吃掉；同时对談判也有好处，这个意見在征得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后实行了。这时，我們在解放区尤其是新解放区正放手发动群众，由反奸反霸而减租清算，群众运动在轟轟烈烈地开展，有的地方，农民甚至自发地起来解决土地問題。这样，自日本投降后，解放区不但迅速地扩大了，而且从根本上巩固起来了。正因为我們一方面参加和談，一方面又准备自卫，我們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双十协定”虽然簽訂了，但蔣介石絲毫也不打算遵守。“双十协定”于十月十二日公布，十三日蔣介石就对其部下頒发了“剿匪”密令，命令他的將領，要遵照他所訂的所謂“剿匪手本”，“督勵所屬”，对解放区“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这就是說，他已下令对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但是，蔣介石的軍事进攻，在解放区軍民英勇的反击下遭到了可耻的失敗。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进攻我上党地区的閻

錫山部国民党軍三万余人被我軍全部歼灭，連其指揮官第十九軍軍长史泽波等許多高級將領皆被我軍俘虏。这就是著名的上党战役。十月底，我軍在規模更大的平汉战役中，在邯鄲地区消灭了沿平汉綫进犯我晉冀魯豫解放区的国民党軍七万余人，其高級將領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八軍軍长高树助于战場举行起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軍軍长馬法五等人則被迫放下武器。

解放区軍民的胜利也推动了国民党統治区反内战运动的高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九日，重庆各界成立了反对内战联合会。二十五日，昆明举行了盛大的反内战集会，由于国民党反动軍警的橫暴干涉，激起了昆明数万学生的总罢課。至十二月一日，便发生了举世轟动的“一二·一”惨案。接着，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为援助昆明学生的游行示威，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統治区。

中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坚决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改換其干涉中国内政的手法。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国政府宣布調回其臭名昭著的駐华大使赫尔利，另派馬歇尔以特使名义来华“調停”中国内战。很显然，美帝国主义妄图亲自出馬，指揮着蒋介石国民党来共同串演一出“和平”的活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十二月于莫斯科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會議上，美国才同意了苏联一再坚持的关于中国問題的決議，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

由于上述三方面的原因，即解放区軍民自卫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統治区人民反内战运动的高涨和莫斯科三国外长會議对中国問題的決議，特别是由于第一方面的原因，蒋介石才被迫

同意召开“双十协定”中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

我党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和我，共七人。这时董必武同志已在重庆。（叶剑英同志后来参加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由秦邦宪同志代替他为政协委员。）我们在周恩来同志的率领下，于十二月十六日飞赴重庆。重庆，这个我曾经生活和斗争过多年的故乡城市，却一直呻吟在黑暗的反动统治之下，如今我又从革命的圣地延安归来，我到达重庆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感慨。

我们到重庆后，即向国民党提出：必须在政协开会之前，实行无条件停战。国民党在当时军事政治都处于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同意了我们的主张。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同时下达了停战的命令，并规定这一命令于十三日起生效。但是，蒋介石在停战令公布之前，却先向他的军队发出了“抢占战略要点”的密令，这就清楚地证明了蒋介石绝不肯真心停止内战，只不过是利用停战来作为其进行内战的烟幕罢了。

与发布停战令的同时，政治协商会议也于一月十日开幕。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方代表共三十八人，其中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九人、青年党五人、无党派人士九人。它的成分极为复杂，大致说来，可分为左、中、右三种势力。左派即革命派，以共产党为代表，它代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主张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右派即反动派，以国民党为代表，它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坚持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中间派也可以说是

改良派，它主要地代表着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幻想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舊民主主義，民主同盟基本上屬於中間派。這時的青年黨已公開脫離民主同盟，成了國民黨的附庸；民社黨雖然表面上還留在民盟裡面，實際上也屬於右派的勢力。在無黨派人士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而以中間派居多數。我們的方針是爭取團結中間派以便和反動派進行鬥爭。

這次會議前後共歷時二十二天，開了十次全體會議和許多次分組會議。（分組會有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事問題、國民大會和憲法草案等五個組，我參加的是憲法草案組。）無論在全體會議上和分組會議里，都充滿了鬥爭。爭論的焦點仍然是軍隊問題和政權問題，即所謂軍隊國家化和國家民主化的問題。

國民黨反動派及其仆從提出了“軍隊國家化”的問題，說什麼必須先有軍隊國家化，然後才能政治民主化，企圖以“民主”作釣餌，來勾去人民的軍隊。針對着蔣介石的這一陰謀，我黨指出：要想實行軍隊國家化，必須首先實行國家民主化與軍隊民主化。即是說要把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國家變為民主的國家，要把蔣介石私人軍閥的軍隊變為人民的軍隊。在這兩條原則的尖銳鬥爭中，有些中間派人士居然想走“第三條道路”，他們幻想國共雙方都交出軍隊，由他們來代表“國家”加以接收。但是，天地間哪有這麼便宜的事情呢？他們的幻想終於落了空。

關於國家民主化的問題，爭論也是一樣的激烈。國民黨既不愿在當時把它的獨裁政府改組為民主聯合政府，只希望以擴大幾個政府委員之類的辦法來搪塞全國人民的壓力；也不愿在以後實行真正的民主與憲政，只想在舊國大代表仍然有效和所

謂“五五憲草”的基礎上，作點換湯不換藥的改變；不僅如此，它甚至妄圖在“統一國家主權”的名義下，把解放區一口吞掉。針對着蔣介石的這一陰謀，我黨一方面堅持要實行地方自治，各省民選省長，自製省憲，以此來保障解放區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存在和發展；另一方面則要求把國民黨反动政府改組為真正的民主聯合政府，並且要在它的領導之下，召集真正的國民大會和制定真正民主的憲法，以此來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為人民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創造一些條件。在這個問題上，某些中間派人士注意的中心是政府委員的分配以及什麼總統制、內閣制之類的東西，也就是說，他們爭的是舊民主主義和個人的地位，並不是新民主主義和人民的利益。

經過一場尖銳的鬥爭，政治協商會議終於通過了關於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事問題、國民大會和憲法草案等五項決議案。這些決議雖然離我黨的要求還很遠，但卻在不同程度上有利於人民而不利於蔣介石的反動統治。

政協會議的召開和政協決議的公布，使全國人民特別是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歡欣鼓舞，不少的人都以為中國從此即將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階段。其實蔣介石只不過是利用政協來進行和平欺騙，以配合他這時正在那裏進行的全國規模的內戰準備。

對於蔣介石的一切，我黨從來不抱任何的幻想。蔣介石曾在政協會議的開幕詞中提出了所謂給人民自由權利、各黨派平等合法、推行地方自治和釋放政治犯等四項諾言。在要求國民黨釋放我們被捕同志的時候，我們會反復考慮，是開出一大堆的名單好呢，還是只提出個別的同鄉？我們估計到國民黨的反動性，認為把某些同志提出來，不僅不能使他們得救，甚至反

而会引起国民党对这些同志的注意，增加他們的危險。因此，我們最后只提出了廖承志和叶挺两位同志。此外，我們还提出要释放张学良將軍。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虽然惧于全国的輿論和我党的力量，不得不把廖承志同志和叶挺同志放了出来，而对其他同志則一个也不放。甚至连张学良將軍（虽然当时各界人士都提出了释放张学良的要求），它也不肯释放。所謂释放政治犯，原来是一个騙局。

还在政协会議开会期間，国民党特务就开始了對政协的破坏活动，滄白堂事件^③和搜查民盟代表黃炎培住宅的事件都是在这时发生的。而当政协会議閉幕后，二月十日，重庆各界人民正兴高采烈地在較場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的大会时，国民党特务却大打出手，在会場上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六十余人，这就是轟动一时的較場口事件。接着，二十二日国民党反动派又无耻地在重庆制造反苏游行，組織特务流氓搗毀了我新华日报营业部，并把我們的工作人員楊黎原等同志打得遍体鳞伤。与此同时，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营业部也遭到特务們的搗毀。类似的挑衅事件，一时曾遍及国民党統治区。所有这些，都証明国民党已蓄意撕毀政协決議。果然，在三月上半月召开的国民党的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就公开声明，对政协決議要“就其犖犖大端，妥筹补救”就是說要从根本上加以修改和撕毀。三月下旬至四月初，国民党又召开了它御用的国民参政会的四届二次會議。在这个會議上，蒋介石发表了又长又臭的演說，大弹其反动透頂的法西斯的法統論之老調，表示要坚决撕毀政协決議和三月二十七日剛訂立的东北停战協議。至此，蒋介石发动內战的陰謀已經昭然若揭了。

蒋介石这一套阴谋诡计，都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下进行的。美帝国主义一面用各种方法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特别是用海軍把大量的国民党軍运到了内战前线；一面却装作“和事佬”来进行“調处”。馬歇爾一开始就只主张在关内停战，不主张关外也停战，他和蒋介石一样，妄图让国民党軍占领东北后，再集中力量到关内来消灭我們。当时設立在北平的軍事調处执行部和它派出的执行小組，虽然是由美、蔣和我們三方面組成的，但美国人总是站在蒋介石方面，拿“調处”来为蒋介石的軍事服务。哪里对国民党的軍事不利，执行小組就被派到那里去，以阻止我軍的前进，和挽救国民党軍的失敗；而当国民党軍发动进攻时，执行部却任意不理，或借故拖延，不去調处，以便让国民党軍放手进攻，取得某些軍事上的便宜。美帝国主义的这套把戏，一时确实欺騙了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所謂中間人士。但到后来，它的馬脚就逐渐露出来了。

对于美、蔣的阴谋，我們进行了針鋒相对的斗争。我們一方面和它們进行談判，一方面又不断揭露它們的阴谋。例如对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演說，我們解放日报就发表了著名的社論——“駁蒋介石”，彻底地揭穿了他恶毒的阴谋，狠狠地打击了他疯狂的气焰，把他駁得体无完肤。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壮大我們解放区的力量。这时，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我們已放手让农民去解决土地問題，为此，我党中央曾于五月四日发布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五四指示”。在群众发动的基础上，解放軍的实力得到很大的发展和巩固。

我們虽然主要地依靠解放区的力量，但同时絕不放弃在国民党統治区的斗争。由于国民党政府要“还都”南京，我們的

代表团也必须迁移，我党决定把四川省委公开出来，以便进行统战工作和对国民党作斗争。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最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了省委，介绍我和王維舟同志是省委的正副书记。周恩来和董老等同志离开重庆后，没有他们的直接领导，我们更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了，但是，我们省委的全体同志都很有信心，愿意兢兢业业地去完成党所交付的光荣任务。

省委一经公开，我和王維舟同志即四处活动，争取在事实上得到合法的地位。五月十九日，馮玉祥在重庆北碚召开了一个张自忠殉国的纪念会，我们用省委的名义送了一付挽联，写道：“已令日寇灭亡，忠魂可慰；再令生灵涂炭，人民何堪？”由于这付挽联被放在灵堂中最显著的地方，而各报纸又纷纷加以报道，因此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打电报问国民党中央：“为什么允许他们公开？”国民党中央令其重庆行营查复。这时，行营主任张群不在，国民党重庆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篤倫跑来找我，他说：“你们公开，我是知道的，但手续不周到……你看该如何电复中央呢？”他言词中有责难之意。我于是立即向他指出：“第一，蒋介石在政协开幕时答应四项诺言中，有各党派平等合法的一条，我们的公开是有根据的；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有组织的政党，我们在这里有办事处，有报馆，有党员就应有党的组织；……我们的理由是很充足的。”张篤倫无法，只好说：“我就这样回复中央吧。”经过这一番压迫无效之后，事实上，我党的公开，国民党官方已被迫承认了。

但是，这时的情况已十分紧张。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帮